

中美纽约渠道的建立与作用 ——以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为依据

栗广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 自1969年开始, 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为了增进互信、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美两国都有意在两国之一建立一条直接联系渠道, 以利于彼此的交流。但由于双方先后在建立新渠道的地点、人选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 建立新渠道的过程一波三折。后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新渠道得以建立, 这就是纽约渠道。纽约渠道的建立对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缓和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为中美两国进行及时有效的直接接触创造了条件, 进而使两国在众多重要的国际和双边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 促进了双方的谅解与合作。而双方的谅解与合作又反过来推动了两国互信的加深, 为之后的中美战略合作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纽约渠道; 中美关系; 基辛格; 黄华

中图分类号: D8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5-0232-06

纽约渠道是在中美缓和已初步实现、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情况下, 中美在两国之一建立的第一条直接进行联系的秘密渠道。纽约渠道建立的初衷是解决中、美两国所共同关心的一些紧急重大的国际问题。通过该渠道的秘密联系, 中美两国在当时所共同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上保持了密切接触, 进行了2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密切合作。

近些年来, 中美建交之前的联系渠道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此之前, 已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中美建交之前的各联系渠道——包括朝鲜停战谈判中的中美谈判、日内瓦领事级和大使级会谈、华沙渠道、巴基斯坦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巴黎渠道和中美联络处等进行了专门性的研究, 也产生了不少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成果。这些成果不约而同地肯定了上述渠道在中美建交之前的联系过程中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认为华沙渠道的作用是试探了彼此的态度, 巴基斯坦渠道为两国领导人传递了信息, 巴黎渠道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了安排, 联络处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

尽管海内外学界对上述渠道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 但对于纽约渠道的研究却相对滞后。除了笔者在新近拙作中对纽约渠道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起之作用进行了初步研究之外^[1], 据笔者目力所及, 至今尚未见到对该渠道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论著。尽管对纽约渠道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 它的神秘面纱似乎

还未被完全掀开, 但其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1971年11月至1973年5月中美联络处建立, 双方外交人员通过纽约渠道进行了多达45次的直接接触, 就两国所共同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 并在其中一些问题上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密切合作, 促进了此类问题的解决。鉴于此, 本文将力图使用已刊习见的美方原始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下文简称为“FRUS”)和尼克松、基辛格、黄华等当事人的回忆录等文献资料进行研究。除此之外, 笔者还将利用国外研究美国外交史所常用、但在国内则少有人使用的数据库——由Gale公司提供的“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下文简称为“DDRS”)的未刊档案资料, 以之与前述档案文献互相补充, 以最大程度地确保研究过程、研究结论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本文将侧重于对纽约渠道的形成过程进行研究, 并对该渠道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简要的分析, 以期为推动对该渠道的研究尽绵薄之力。

一、纽约渠道建立的前奏

1960年代末, 不利的世界形势使得中美两国不得不认真考虑放弃坚持了20余年的敌对政策。尼克松

收稿日期: 2013-01-17; 修回日期: 2013-04-07

基金项目: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纽约渠道》

作者简介: 栗广(1984-),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冷战国际史, 现当代中外关系史。

上台后仅仅 10 天,就指示基辛格尽一切努力与中国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系”,开始寻求与中国进行接触。自当年 8 月始,两国通过华沙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和巴基斯坦渠道的沟通,使双边关系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缓和态势。为了尽快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尼克松政府曾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中方提议,希望在北京或华盛顿与中国领导人面谈^[2]。但是,由于长期敌对造成的互不信任情绪在两国人民心中根深蒂固,要化解这段恩怨、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双方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密切交流以促进彼此在涉及双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达成谅解。在两国尚未建交的情况下,一条保密性强、又能使双方进行直接沟通的联系渠道不可或缺。因而,1971 年基辛格在首次访华时即将此事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基辛格与周恩来进行会谈的第一天,他就将开通直接联系渠道的问题与台湾问题等一起作为重要问题提出,并在当天的会谈中数次提及。而且他还特地强调,这一渠道能够促进两国进行“直接的秘密交流”而不再依赖于任何第三国的“善意”,它应“完全由我们两国领导人控制”^{[3](362)}。这一提议正符合中方的意愿,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他十分清楚,中美在第三国建立的联系渠道虽然能够为双方交流提供条件,但不论双方外交人员如何小心,这种联系很难长时间保持秘密状态。因此,周恩来在基辛格建议的基础上提出,希望美方人员(基辛格或其信任的其他高级代表)下次访华时可以在中国停留更长时间,而非仅仅进行短暂的访问;如果会谈在中国境内进行,其安全性和保密性将有所保障。在此次会谈中,两国高层试图在中国或美国建立一条直接联系的秘密渠道的想法隐约可见。但由于这是中、美高层进行的首次直接会晤,此时基辛格尚无从了解北京“向华盛顿开放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因而未敢采纳在中国开辟一条新的秘密渠道的建议。在他看来,此时与“共产党中国”交往过于密切,在国内可能引起一些反对势力的不满,在国外则会引起日本、蒋介石政权等的极力反对,这些反对者的竭力阻挠将很可能导致尼克松接近中国的计划破产。如此一来,美国在过去两年煞费苦心地采取的行动都将是徒劳。事实证明基辛格的顾虑并非多余。当 7 月 16 日中美两国公开宣布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时,舆论哗然,特别是引起了蒋介石政权的强烈不满^{[4](554, 555)}。事实上,此时中国方面对接受美方代表长期在北京停留的提议也并非完全放心。周恩来也意识到,突然与势不两立的“美帝”接近将会削弱其在北越、阿尔巴尼亚等强烈反美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的威

望。中国在宣布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之后,遭到这些国家——特别是正在与美国进行战争的北越的激烈反对^{[5](178)}。为此,在基辛格对中方提议表现得十分犹豫的情况下,中国方面也不得不对这种风险进行慎重考虑。

尽管在后来的会谈中基辛格多次提及此议题,并试图提出新的方案,但由于此时双方的互信基础尚不牢固,两国都不敢过于冒险^{[3](363-36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基辛格此次访问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双方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同意先在巴黎——法国既是美国的北约盟国,也是当时少数几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之一——建立一条秘密联系渠道,以之作为当下中美两国进行联系的主要渠道。等到时机成熟之际,再建立更为便利的联系渠道^{[3](456, 457)}。

由此可见,巴黎渠道的建立是中、美两国在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渠道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所采纳的折中方案。尽管该渠道的建立并非中、美双方的首要选择,但从客观上而言,该渠道在两国的交往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后来筹备建立纽约渠道的最后过程就是通过巴黎渠道进行的。因此,虽然首次中美高层会谈未能成功地在两国之一建立直接联系渠道,但这次会谈一方面促进了双方对所关心的众多问题进行了交流,并在一些问题——如南亚危机、越南战争和联手抗苏等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一致,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另一方面,此次会谈也产生了巴黎渠道。这些会谈成果都为纽约渠道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二、纽约渠道建立的契机

基辛格秘密访华事件公开之后,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特别是引起了苏联的不安。苏联的直接反应是于 1971 年 8 月与印度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7](88)}。中、美两国都意识到了印苏结盟对南亚地区和平所带来的危险性,因此加快了彼此接近的步伐,其表现之一就是加紧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渠道。就在巴黎秘密渠道开通仅一周后,基辛格就飞赴巴黎,与中国驻法大使黄镇进行会谈,期间专门谈到建立所谓的“渥太华渠道”的设想。由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特殊关系且在地理上毗邻,基辛格特地请黄镇将一封问候信转交不久前就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的黄华,希望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通过渥太华与黄华取得联系,建立一条相对便利的渠道,即渥太华渠道。在信的末尾,基辛格还附上了其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以便黄华在任何“紧急情况下”能够随

时联系到他,并且在必要时可以得到来自基辛格的“任何帮助”。中方虽然也意识到了建立更为安全、便利的联系渠道的必要性,但并未对上述建议作出直接回应,而是建议基辛格在10月访华时直接与周恩来就此问题进行商议^[8]。

在10月的“波罗二号”行动中,基辛格多次直接或间接提出在北京或华盛顿建立直接联系渠道的议题,美方外交人员甚至提出双方可以先建立一个“半官方性质”的直接联系渠道。由于在7月的中美高层会谈中周恩来提出的在北京建立新联系渠道的建议被美方所拒绝,因而他对美方的建议表现得小心翼翼,对该提议不置可否。实际上,从该次高层会谈的记录来看,周是赞成在两国之一建立这样一条联系渠道的。但这一次,在基辛格同意将新联系渠道建立于北京的情况下,双方又在美方拟派遣代表的人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基辛格提议以布鲁斯(David Bruce)作为美方的代表时,周恩来却对原本十分感兴趣的问题避而不答,突然将话题转移开来^{[3](557)}。其原因是,在周恩来看来,布鲁斯仅为大使级官员,其级别达不到中方所要求的“高级代表”的层次,以其作为会谈代表难以在重要问题上取得突破。也就是说,中方反对的不是建立新联系渠道本身,而是美方拟派出的谈判人选。正是由于双方在新联系渠道的人选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建立直接联系渠道的努力再次归于失败,该问题也继续被搁置。但是中美关系的不断推进使得此类直接联系渠道日益成为必要。

就在“波罗二号”行动行将结束之际,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9]。这意味着,尽管中、美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此后中国外交人员可以以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身份在纽约自由活动而不至于引发外界的过度关注,从而为纽约渠道的建立创造了双方期待已久的条件。这一让中、美两国都始料不及的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解决了建立新联系渠道的人选问题,另一方面也使纽约顺理成章地成为新联系渠道的建立之处。收到邀请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信函之后,中国政府决定立刻派代表团参加正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中国高层在经过内部讨论之后,认为黄华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在与加拿大政府进行商议并征得同意之后,中国政府决定委派黄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代表团”副团长及中国常驻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代表,陈楚为副代表^[10]。至此,中美两国在纽约建立秘密渠道的所有现实条件皆已具备。一旦有任何紧急情况需要双方立即进行协商,这条新联系渠道可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

三、纽约渠道的正式建立

黄华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代表,这一任命在美方看来具有“不同寻常”的意味:黄华作为中国最为著名的“美国通”之一,在中国外交界具有“崇高的地位”。他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或将在今后的中美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在一直谋求建立一条更为安全、便利的新联系渠道的基辛格眼中,这次任命可能是北京试图利用黄华“与美国政府建立联系”的前兆^{[11](1072)}。

在中、美两国已就增进谅解、加强合作这一问题达成共识且黄华已赴纽约任职等条件皆已经具备的情况下,1971年发生于南亚次大陆的这场危机和战争成为纽约渠道建立的催化剂。是年11月,眼见印度对巴基斯坦战争已迫在眉睫,美国希望与同样反对印度发动战争的中国保持沟通,以共同对印度施加压力。于是,美方开始采取行动,通过巴黎渠道正式向中方提出了建立纽约渠道的建议。

11月15日,美国驻巴黎武官沃尔特斯受命拜访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向中方人员表示基辛格希望在11月20日与黄镇进行会谈。但因其时黄镇不在巴黎,沃尔特斯只得留下一封来自基辛格的信件,向中方建议:鉴于巴黎渠道无法就世界上一些突发的重要事件取得即时的联系,因此希望两国在纽约开通一条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与美方外交人员进行直接联系的新渠道。如若中方同意,中美两国可以仍将巴黎渠道作为双方联系的主要渠道,以之处理两国之间的一些“主要的、长期的政策问题以及敏感的问题”,同时将纽约渠道作为双方处理一些亟待作决定且与两国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的渠道。中国方面考虑到,中国重返联合国使其肩负的国际责任大为增加,在很多重要问题——例如南亚危机问题上需要与美国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以促进彼此的理解与合作,因而一条更为便捷的联系渠道对于两国而言已不可或缺^[12]。在20日的巴黎会谈中,中方接受了关于建立纽约渠道、由黄华作为中方代表的建议。同时,中方还在当天给美国政府的信中特别强调,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纽约渠道的秘密状态。

中方的肯定答复让一直致力于建立新联系渠道的基辛格喜出望外。在两国高层已就建立纽约渠道一事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该渠道的建立十分迅速。11月23日,基辛格和黄华按照约定时间在纽约东区、属于中央情报局的一栋小公寓里进行了第一次会晤,纽约渠

道最终得以建立。

纽约渠道建立于中美关系初步实现缓和的时期，也是双边关系能否最终实现正常化的最为敏感的阶段，其所担负的任务、所起的作用及扮演的角色与两国建交之前的其他联系渠道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该渠道本身具有独特之处。首先是纽约渠道的安全性高。纽约渠道作为两国之间的首条建立于两国之一的联系渠道，它基本上不受外界干扰，其安全性自然有所保障。其次是会谈代表的不固定。纽约渠道建立于纽约，而纽约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双方外交人员都能随意在纽约活动而不至于引起外界的过度关注，因而双方可以根据会谈议题的重要程度来灵活安排谈判代表：遇到紧急重要的情况，由双方的主要代表进行会晤；一般性议题则可由其他外交人员进行交流。再次，纽约渠道与其他渠道并存且存在着互相补充的关系。一方面，纽约渠道的建立是中美双方通过巴黎渠道等进行商量的结果。另一方面，在纽约渠道运行的同时，巴黎渠道和中美高层在北京进行的面对面会晤共同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交流，基本上实现了两国之间的无障碍沟通。最后，纽约渠道建立的初衷是双方合作处理“一些紧急、重要的问题”，这一点与罗马尼亚渠道、巴基斯坦渠道等致力于实现中美关系解冻的目的有所区别。尽管纽约渠道定位于解决“紧急、重大的问题”，但后来却与中美高层会晤一道构成了两国“进行联系的主要渠道”，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13](914)}。

四、纽约渠道的作用

在纽约渠道建立之后，中美两国代表在纽约的联系活动变得十分频繁。双方在不足一年半的时间内进行了多达45次秘密会晤，就两国所共同关心的众多问题进行了密切的沟通，促进了彼此在众多问题上的谅解。

尽管中美双方在纽约渠道建立之初都一再强调，纽约渠道将仅被用于交流双方所关心的“紧急、重大的问题”^[14]，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该渠道的作用远非仅限于此，而是扩展到两国共同关心的所有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在国际问题上，两国通过纽约渠道对众多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促进了对彼此所持立场的谅解。在其中的一些问题上，双方还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推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中美两国在1971年印巴战争中的密切合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印巴战争爆发仅仅两天后，中美两国就通过纽约渠道进行磋

商，讨论应对方案。通过直接的沟通，两国就反对印度、支持巴基斯坦达成了一致：双方除了在外交上共同支持巴基斯坦以外，还各自对巴提供了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援助，迫使印度接受了联合国的停火决议^{[15](188, 189)}。在笔者看来，这场战争实际上加速了纽约渠道的产生，而双方通过纽约渠道的合作又成功地迫使印度停止了战争，使中美关系顺利通过了缓和以来的首次重要考验，为后来中美战略互信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结束越南战争这一问题上，纽约渠道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同巴黎渠道一起，成为中美两国就越战停火问题进行沟通的主要渠道。在越美和谈的关键期，中美通过纽约渠道的几乎所有会谈都会涉及到这一问题。中方通过纽约渠道和巴黎渠道同时将越南的想法传达给美国，也将美国的建议告知越南，起到了沟通越、美两国的桥梁作用，有助于越、美两国和平协定的达成^{[16](659)}。因此，如果说中国在结束越战问题上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话，那么纽约渠道功不可没。此外，两国通过纽约渠道就联合抗苏、联合国秘书长人选、朝鲜半岛局势等众多国际问题也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与合作。

除了对两国所关心的国际问题外，中美两国也通过纽约渠道对双边关系中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沟通，降低了两国因在这些问题上的误解而导致关系逆转的可能性。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在纽约渠道中提到次数最多的问题之一。虽然通过该渠道的会谈亦未能促使台湾问题的解决，但美国通过纽约渠道向中方通报了其台湾问题的态度及其为制止台独势力所作的努力，避免了中方因对美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的误解而导致中美缓和进程的停滞^{[3](598)}。除台湾问题之外，在中美之间的其他问题上，两国也通过纽约渠道进行了及时的沟通。例如，1972年3月发生了美国飞机进入中国南海领空的事件。黄华立即就此事向基辛格的副手黑格(Alexander Haig)表示抗议，黑格当即保证将对此事进行彻查。后特地就此事向中方解释并道歉，指出美方飞机误入中国领空是雷达故障所致，并承诺美方将会竭力避免此类事件发生。黄华对黑格的表态表示满意^[17]。后来美方的此类行为确实有所收敛。又如，1972年3月初中国驻联合国外交人员在纽约遇刺之后，时任基辛格军事顾问的乔纳森·豪(Jonathan Howe)在与黄华的会谈中不仅对刺杀行为进行了谴责，且积极协助中方人员寻找更为安全的住所，并承诺追查此案，以给中方满意的答复。美方此举赢得了中方人员的赞赏^[18]。客观地说，在纽约渠道的会谈中，虽然并非中美两国之间的所有问题都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无论如何，双方外交人员通过纽约渠道所进行

的坦率沟通使彼此了解到对方在某些问题上的态度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所在,增进了彼此的理解和互信。

但不可避免的是,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技术,两国通过纽约渠道的沟通也会出现不充分的状况。例如,1971年12月9日,黄华在未与中国政府进行及时沟通的情况下,在与基辛格会谈时对南亚形势作出了强硬的表态,致使尼克松和基辛格一度误认为“中国人要动手了”。后来的结果证明,黄华在与基辛格会谈时的表态并非中国政府的意见,而只是其个人的意愿^{[13](1059,1060)}。事实上,黄华的这一表态后遭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19],因而该表态并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由此可见,尽管纽约渠道的安全性和保密性更佳,但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不足。

五、结语

纽约渠道产生于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合作、从紧张走向缓和、从互不信任走向建立互信关系的特殊阶段,具有与这一阶段中美关系发展状况相匹配的内在特性,这就注定了中美两国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必须经历一番互相试探、乃至经历一些考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消彼此之间因长期敌对而存在的疑虑。正因为如此,纽约渠道的建立过程一波三折。尽管如此,出于进一步促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需要,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纽约渠道终于得以建立。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纽约渠道和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是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的。一方面,只有中美关系缓和达到一定程度时,两国才可能产生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渠道的愿望。亦即,纽约渠道是双边关系缓和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另一方面,纽约渠道是为了适应中美关系继续改善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缓和起到了推动作用:两国通过纽约渠道进行的联系,在越南战争、印巴战争、朝鲜半岛问题、联合国事务及联合抗苏等方面进行了及时的沟通和广泛的合作。总而言之,中美缓和的初步实现催生了纽约渠道的建立,而纽约渠道又促进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缓和。中美两国通过纽约渠道所进行的沟通与合作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两国摆脱了六七十年代之交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形势。

注释:

对于这个课题,海内外学者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相关代表作有:Yafeng Xia. *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 U.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7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夏亚峰. 重评 1961—1968 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C]//李丹慧. *冷战国际史研究(4)*.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Kenneth Young.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1953—1967*.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Nancy Tucker.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Steven Goldstein. *Dialogue of the Deaf? The Sino-American Ambassadorial-level Talks, 1955—1970* [C]// Robert Ross & Jiang Changbin,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U.S.-China Policy, 1954—197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tc. 中国学者的相关代表作有:郑华. 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巴黎渠道.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8(4): 80-86; 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巴基斯坦渠道. *史学集刊*, 2008(3): 72-77; 肖文黎. 戴维·布鲁斯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外交活动研究. *历史教学*, 2008(4): 39-44; 美国对选择布鲁斯为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考量. *历史教学*, 2007(2): 40-44.

“Deep Background” (off the record) conversation with Henry Kissinger regarding his 7/9-9/11/71 trip to China to pave the way for a future visit to that country by President Richard M. Nixon. Kissinger summarizes his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mier Chou En-lai, Jul 19, 1971, Washington. CK3100565346, Database: DDRS, Gale Group, Inc.

Memorandum for DR. Kissinger, September 7, 1971, Washington. CK3100546898, DDRS.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Ron Ziegler and Henry Kissinger provide a Background Briefing with the News Media to Bring them Up-to-date on President Richard M. Nixon's Plans to Meet with Chinese Officials in Peking, July 16, 1971, California. CK3100565332, DDRS.

In a 10:35 a.m. Conversation with Henry Kissinger, Professor Jerome Cohen Suggests that Kissinger Meet with Chinese Ambassador to Canada Huang Hua while in Ottawa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President Richard M. Nixon Planning a State Visit to China, May 26, 1971, White House. CK3100573132, DDRS.

尼克松与基辛格将秘密访华之旅的代号定为“波罗行动”,意指此行像 700 年前的探险家马可·波罗造访遥远神秘的东方一样,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风险。基辛格 1971 年 7 月 9-11 日的首次访华行动被称为“波罗一号”行动,是年 10 月 20-26 日的访华行动被称为“波罗二号”行动。

White House, Memorandum for Mr. Kissinger, Henry Kissinger is Provided with a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in Vietnam and other World Developments, November 5, 1971, Washington. CK3100550559, DDRS.

Message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vember 20, 1971.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Kissinger Papers, Geopolitical Files-China, Chron., 1 September-29 December, 1971.

White House, Henry Kissinger is Provided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Situation in Vietnam and other World Developments, December 10, 1971, Washington. CK3100554669, DDRS.

参考文献:

- [1] 栗广. 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纽约渠道——以新近披露的尼克松总统安全档案为依据[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2(4): 30-39.

- [2] 毛泽东外交文选[C].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69—1976, Vol. XVII, China, 1969—1972 [Z].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 [4] 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M].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A Filmways Company, 1978.
- [5] Odd Westad, etc..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Vol. 5, No.22 [M]. Washington D.C.: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Center for Scholars, 1998.
- [6]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 苏修关于印度问题的言论(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5.
- [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Paris, September 13, 1971, FRUS, 1969—1976, Vol.E-13, Documents on China, 1969—1972, Document 19[EB/OL].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13/d19>, 2013-01-15.
- [8] 新华社. 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美帝国主义的惨败, 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驱逐蒋帮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案[N]. 人民日报, 1971-10-27(1).
- [9] 熊向晖. 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回忆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过程(续)[J]. 百年潮, 1997(2): 18-27.
- [10] 陶文钊.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3卷)下[Z].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 [11] Memorandum for Record, Paris, November 16, 1971, FRUS, 1969—1976, Vol. E-13, Documents on China, 1969—1972, Document 58 [EB/OL].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13/d58>, 2013-01-15.
- [12]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Limited, 1979.
- [13] Memorandum for Record, Paris, November 20, 1971, FRUS, 1969—1976, Vol. E-13, Documents on China, 1969—1972, Document 64[EB/OL].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13/d64>, 2013-01-15.
- [14] 黄华. 亲历与见闻: 黄华回忆录[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 [15]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C].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 [1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New York, April 26, 1972, FRUS, 1969—1976, Vol. E-13, Documents on China, 1969—1972, Document 127[EB/OL].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13/d127>, 2013-01-15.
- [1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New York, March 6, 1972, FRUS, 1969—1976, Vol. E-13, Documents on China, 1969—1972, Document 110[EB/OL].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e13/d110>, 2013-01-15.
- [18] 李达南. 周恩来与1971年印巴战争[J]. 党史天地, 2001(2): 7-9.

On origin of New York Channel between China and US: According to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in Nixon Administration

LI Guang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From 1969, the long-term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US began to thaw. To increase the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normalize Sino-US relations, both China and US wanted to establish a direct channel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Because of the divergence on the place where the channel to establish and the candidates, however, the process that establishing of the new channel was full of twists and turns. Afterwards, the new channel was established as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were ready. It was New York Channel.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York Channel had special implication for the further rapproch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 it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two to engage in timely and effective contact, which promoted th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on a lot of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and bilateral issues, encouraging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had been promotion for the deepening of mutual trust,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Sino-US strategic cooperation.

Key Words: New York Channel; Sino-US relation; Kissinger; Huang Hua

[编辑: 苏慧]